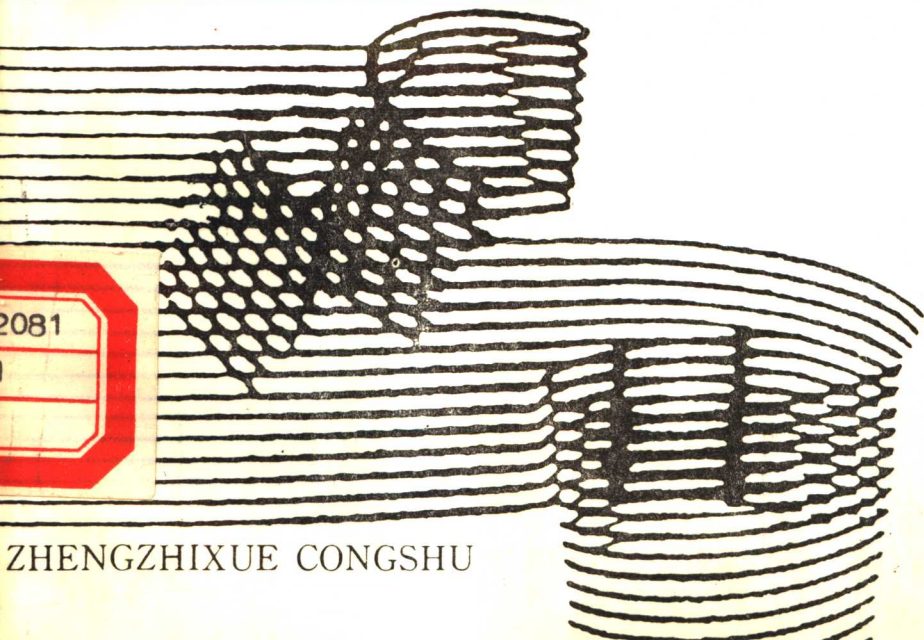


政治学丛书

政治中的人性

[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著

郑永年 李茂奇译



ZHENGZHIXUE CONGSHU

政治中的人性

[英] 格雷厄姆·沃拉斯著

郑永年 李茂奇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A. Constable and Company, London 1929.
根据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192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潘邦顺

封面设计：虞陆中

· 政治学丛书 ·

政治中的人性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 著

郑永年 李茂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刷二分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宁波庄桥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插页2字数155000印数0001-463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213-9/D·37 定价：1.85元

政治学丛书



主编 郑永年

编委 王小山 刘庆民

郑永年 胡杰

“政治学丛书”总序

现在，人们普遍地认识到，我们中国应当并且能够发展在世界政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政治学。伟大的理论往往是和伟大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的。而20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我们今天正经历着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它给中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20世纪的中国政治时，完全有可能认为，目前的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关键的时期。

希望是有的，且是美好的，但路还有待于我们去开拓行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有举世无双的成就，也有重大的挫折和失误；有史无前例的壮举，也有不堪回首的悲剧。历史的反反复复的症结在何处，需要我们深思、反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建设，需要我们研究、探索。政治学要担负起这个社会的政治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曾使一个贫穷的中国，一个被称之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扶立起来。我们今天的改革无疑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她需要发展。发展需要环境。环境是多方面的，不过无论如何不能缺少这二者，一曰缤纷复杂的现实问题，二曰富丽多彩的思想

意识。在我们这个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异乎异常地产生了种种政治理论。理论是现实问题的产物。各种理论可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或建议，当然其可行性取决于实践而非个人的主观。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政治学，应当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从其他种种思想意识中有选择地汲取养份，然后消化之。换言之，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汲取当今世界政治学领域可为我们采用的理论，在伟大的时代的基础上创造一门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富有世界性的中国政治学。

“政治学丛书”编委在前辈的扶植下，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创办“政治学丛书”。它意在较系统地译介介绍20世纪国外政治学知识。丛书所译多为当代公认的较优秀的著作或影响较广的著作。同时，我们还组织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两者并重，希冀在中国政治学建设过程中，竭我们绵薄之力。

牛顿曾谓，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他人的肩膀上。“酸葡萄”（伊索寓言·狐狸与葡萄）的时代已过去。我们深信，如果我们踏踏实实，虚心学习，敢于攀登，“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鲁迅语），造成一个好的学术气氛，填补我国政治学各方面的空白，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创造性发展为期不远矣！

这是我们的期待！是为序。

“政治学丛书”编委会

1987年10月

译者的话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英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1858年生于散德兰, 卒于1932年。1877—1881年, 在牛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1881—1890年任古典学校校长; 1890年后, 任大学公开讲演讲师; 1895—1923年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914—1923年任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 1912—1915年任皇家行政事务委员会委员; 1914年, 任波士顿洛厄尔(Lowell) 讲座讲师。

沃拉斯一生著作甚丰, 主要有《费边论丛》(Fabian Essays)(1889); 《弗朗西斯·普雷斯生平》(The Life of Francis Place)(1898); 《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8); 《伟大的社会》(The Great Society)(1914); 《我们社会的遗产》(Our Social Heritage)(1921); 《思维的艺术》(The Art of Thought)(1926) 等。

《政治中的人性》是现代社会科学中, 特别是在政治学中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著作。美国历史学家, 政治学家爱·麦·伯恩斯认为, 沃拉斯的“《政治中的人性》和《伟大的社会》两书实际上已成为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当代世界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页)。民主政治理论家G·H·科尔(Cole)认为, 沃拉斯一生的贡献是在《政治中的人性》中作出的, 这本著作是本“真正伟大的著作”。

(*Socialist Thought* (1889—1914), London, Macmillan, 1956, P. 222)。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熊彼特指出,《政治中的人性》是一本“坦率而有魅力的书”,“不管在他以后人们关于这个题目所写的一切,尤其是^不管所有那些详细的实例研究使现在的问题能够远有清晰易见,这本书还是可以推荐为政治心理学最好的入门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1979年,第320页)。

从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的,他们所建构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一些政治思想家开始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沃拉斯便是其中一位先驱。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试图突破传统治学的僵化的状态。作者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认,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使他有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他的研究工作。由于沃拉斯也是一位实际政治家,拥有丰富的实际政治经验,这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本世纪初,当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把西方民主制度奉为福音教义之时,沃拉斯以其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他首先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认为,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他对此种状况感到忧虑,觉得有必要从新角度来阐释西方民主制度。所以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他运用

予他在伦敦选举中获致的成熟的洞察力，以及他作为伦敦学校委员会和伦敦郡议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的成员所得到的这种观察力，来解释民主问题。在实际政治中，沃拉斯发现，与传统政治思想家所认为的相反，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沃拉斯认为，人性由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两部分组成。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公共职位的候选人利用群众容易上当受骗这一点，力图摆布群众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心理给自己创造种种有利条件。政治演说家往往巧妙地利用充满情感内涵的文字和图像，口号和标语，引诱投票人的情感冲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如政党，沃拉斯一方面承认，政党制度是适应人性现实的最有效的制度，可惜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依赖的并不是公民的理性能力，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和激情。资产阶级政党往往在群众中给自己创造一种可辨认的象征符号和口号，象茶叶商标那样任选民挑选。由此带来了无数邪恶，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上的民主和实质上的不民主。

沃拉斯并不满足于《政治中的人性》对于政治行为的敏锐的观察。他具有一种改革家的态度。他是英国费边社运动的领袖之一，并成为费边社的政治理论家。（后来，沃拉斯发现费边社越来越教条主义，与自己的志趣不合而退出了该组织。）他始终关切政治制度的改革，始终不懈地寻求作为这种改革基础的建设性原则。这在《伟大的社会》一书中清晰可见。一般地，人们认为，《伟大的社会》是《政治中的人性》的续篇。在《伟大的社会》中，沃拉斯探讨了怎样强

化政治中的理性因素；社会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使其个体成员接受行为方式，群体行为方式怎样才能在社会总结构中获致自由发展；怎样改革教育，使之在制定社会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增加理性因素，这一切怎样才能由人民自己以民主的方法去完成，而不是使人民在精英人物的统治下或既得利益阶层的压力下去完成。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沃拉斯在这两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发挥，以形成系统的理论。正如科尔指出，虽然沃拉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项他必须完成的十分艰巨的脑力工作，但他用尽毕生的精力也未完成这项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中的人性》开创了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沃拉斯在该书中提倡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对后来的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戈利斯（Michael Margolis）说，“奇怪的是，沃拉斯这位英国人，对美国政治学家们比对其英国同仁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Viable Democracy*, Penguin Books^s Ltd, 1979, P104）。1910年，A·劳伦斯·洛厄尔邀请沃拉斯到哈佛大学讲学，给研究生开设心理学和政治学等课程。在这里，他影响了美国一大批学者，其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洛厄尔和阿瑟·霍尔库珀（A·Holcombe），还有著名的专栏作家里普曼（Liippmann）的名著《政治绪论》是在沃拉斯的直接影响下写就的，另一方面，也使沃拉斯的思想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同时，沃拉斯同当时著名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E·梅里安姆（Merriam），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正如马戈利斯

所说的，“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以前，大学里的政治学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哲学之上的。政治学理论仅只是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政治观的价值作些评论。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之后，政治学变得较具行为性，既研究那些伟大政治思想家的观点的经验適切性，也研究其道德价值。”（同上书，第104页）可以说，当代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兴起应该也有沃拉斯的功劳。

本书根据1929年版译出。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西著经验不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12月于北京大学

第一版序

我感谢我的几位朋友，他们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原稿，给我提出了某些修改意见。他们包括约翰·亚当斯教授，J·H·缪尔黑德教授，A·沃尔夫博士，W·H·温奇夫人，西尼德·韦伯，L·皮尔索尔·斯密和A·E·齐默恩。正是为了感谢他们，我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还保留在本书中，其中一些是用简略的或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的。

我在脚注中力图注出那些我阅读引用过其著作的学者。但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威廉·詹姆士教授所著的《心理学原理》，许多年前，该书使我有意识地期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思考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师的研究工作。

读者常常要求我推荐一些有关政治心理学的书籍。我认为在该科学的现阶段，政治家如果要弄清楚他自己的经验，可以阅读那些论及心理学的论文（它们并不是专门论述政治的，而只涉及到实用政治心理学的文献），这会使他们获益匪浅。那些非政治家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所涉及到的G·塔尔德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意见和民众》（*L'opinion et l'^aFoule*）和《模仿的规则》（*Les Lois de L'Imitation*），及W·特罗特先生撰写的有趣的论文，“论民众的本能”，该文载于《社会学评论》杂志1908年7月号上。本书有关大城市中贫民的政治心理是根据简·亚当斯小姐（芝加哥）所著

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伦理》一书中使人感兴趣的个体观来加以分析的。

格雷厄姆·沃拉斯

第二版序

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除了更正了一些词语上的疏忽外，我未作任何更改。本书出版迄今的十八个月中，虽然英国议会，土耳其，波斯，印度和德国的政治已有了重要的发展，但我仍坚持我关于由现代政府形式产生的心理问题的结论。重新改写，以“现代”的例子取代我在1907年至1908年引用的例子，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除了第一版中所推荐的书以外，这里我还要加上一本书，即W·莫杜格尔先生的《社会心理学》，该书专门分析了本能。

格雷厄姆·沃拉斯

1909年12月，于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第三版序 (1920年)

这一版如同第二版(1910年)一样,进行了重新排印,我只对第一版的版本(1908年)作了一些词句上的更正。

在1908年版,我力图说明了两点。第一点是“唯理智论”的假设——“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理智活动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个过程,人们首先考虑他期待达到的目的,然后考虑能够借此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对所有人类活动的危害性,尤其是对民主政治运行的危害性。第二点是有必要用有意识的、系统的思想成就取代这一“唯理智论”的假设。我认为,“思想方法的发明使得人类文明有可能突破其最初的阶段,获致总体进步。因为思想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成功地解释和预测大自然的变动,而如果我们在使用心智时仅仅采用最简单容易的思想方法,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在1920年版,没有必要像1908年版那样坚持第一点了。战争与和平,俄国反议会制和反理智论的革命的成功,1918年英国的选举,1919年法国的选举,美国政治的动荡,中欧政治制度的崩溃,人类未曾有过的四年间最热诚和英雄式的艰难尝试导致的普遍不幸,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怀疑这一假设,即人无意识地受“启蒙的自我利益”的引导。人们只需把有关现代战争和以往的战争题材的诗画与19世纪有关凡尔赛和柏林战争题材的画及坎贝尔、贝伦格和坦尼森的诗歌比较一下,就可认识到我们现在把人类理性夸张到何等程度。

我的第二点在这个战争残留下来的世界中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假设个人始终且无意识地考虑目的和计算手段，这不再具有很大的危害。相反，危害在于我们可能感到过度疲倦和绝望，以致无法从事有意识的努力，而事实上，唯有通过这种有意识的努力，我们才能思考目的和计算手段。

19世纪诸种伟大的机械发明使我们获致一种机会，为自己选择人类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到我们这个时代，绝大部分人足以维持生存，满足驱使他们把生命传递给下一代的盲目本能。只有绝少数世袭财产所有者阶级或少数组织其他人的劳动的管理者获致了有效的选择。即使当大自然提供给全体人口每年三百天的空闲日（正如在古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时，除小部分外，其他所有人几乎仍把生命耗费在勉强的土地耕作上，或建筑坟冢或宫殿，为本国的君主或外国征服者而劳作。君主能够选择其生活，但他的选择无聊至极。亚里士多德说，“有一种唯一值得注意的生活方式，因为许多能够过任何他们所喜欢的生活的人至多也只能作象桑达那帕罗思人（Sardanapalus）那样的抉择”。

古希腊思想家开始了现代文明，因为他们认为，各个城堡之间的人口贸易迫使他们去思考并回答“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起源是由于城邦能使我们生存；城邦存在的理由是由于它能使我们过好的生活。”

战争以前，伦敦、纽约和柏林成千上万的富人（男人和女人）象桑达那帕罗思人那样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象桑达那帕罗思人那样不满于自己的选择。铁路、煤矿、橡胶园所有者的子女，其中很多人是在驾驶汽车、修建桥梁，甚至狩猎、捕鱼过程中长大的，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性地复活原始石

器时代的生活，但没有那个时代避免缺憾的驱动力。不过，我自己的工作使我和非特权阶层发生了联系。非特权阶层的自由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特殊产物，文明的未来可能依赖于使用他们的自由。一位年轻聪明的机械工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看护“加速”的机器，下班后回到家里，下午6点他在母亲家里的“集体宿舍”中用完茶后，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整个晚上他可能为爱情、冒险、知识和成就等半意识(half-conscious)的欲望而激动不已。另外一天，他可能到他的俱乐部去参加台球比赛，或可能在街角闲荡，等待某个在他离开工厂时向他微笑的女孩，或者可能坐在他的床上或地板上看上一章马克思或霍布森的著作。不过，这个晚上他是从总体上来看待他的生活的。奇怪的是，学校里宗教课程所宣扬的生活方式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但他仍感到谦卑，为求得引导而担忧。他的目标应该是结婚吗？如果是，那么他应该马上要个孩子吗？如果他未能结婚，那么他能避免自我轻视和疾病吗？他应正视社会主义组织者所提倡的那种紧张、不安稳并且仍具有幻灭可能性的生活方式吗？他应该把每个晚上都泡在技术学校而搁置他的理想，等他成为一个富翁后再说吗？倘若他成了富翁，他应该如何使用金钱呢？同时他也有强烈的散步和思念的冲动，但往哪儿散步，思念谁呢？

一位年轻的中学女教师的起居室离街不远，条件不算好。她和朋友在此闲谈到深夜，双方都认为他们过的生活根本不是真实的生活，那么另一种生活是怎样的呢？她的那位高教会(High Church)成员的姐姐把其一身自我牺牲地奉献给了“家庭责任”，这种“家庭责任”还有任何意义吗？她